

← (上接6版)

周其仁：几位学者的发言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主要谈谈我对全球城市的一些理解。全球城市也是城市，它具有所有城市共有的特点，理解全球城市的概念要基于这个基础。城市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人的流动和集聚造就了城市，人群在集聚以后还会继续流动，短期的如出差、访问、贸易、旅游等，长期的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定居和迁移等，这些活动是所有城市的行为基础。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能力差别比较大，有的城市在聚集了人才和资源以后便独自发展，而有的城市可以给别的城市和地区提供广阔的辐射力。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第一指标是城市的魅力与吸引力。以纽约为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纽约，据说在那里可以听到好几百种语言。上海华洋杂居，也是国内城市中发展较好的，但跟纽约相比还差很多。吸引力的差别是全球城市的基础之一，吸引的范围越大，离全球城市的

标准越近。马云为什么要跑去纽约融资？因为纽约为他的公司提供了五千亿美元的市值。不只是马云，需要大笔资金的企业家都会去纽约筹措。可见，纽约城市的吸引力不在其规模的大小，不在其建筑辉煌与否，而在于城市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资源。

再举一个文化方面的例子。纽约时代广场有非常多的剧院，有的戏剧天天演，连续演出30年之久，因为这些剧场面对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我几次去纽约访问，看到很多来自美国其他偏远地区的家庭，一家几代人来到时代广场看剧，同时我还发现来此看剧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纽约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城市之首。

全球城市的第二个指标是城市的辐射范围。城市的辐射能力也是城市建设的关键，是城市变成全球城市的门槛之一。城市的辐射力，关键在于单位范围内集聚了多少优质资源，也就是资源的密度有多少，当资源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它才能外溢出去。

全球城市并不是全球最大城市，萨森教授所讲的三

座城市都不是最大的城市，墨西哥城的占地面积比纽约大得多，但纽约的影响力却远远凌驾于墨西哥城之上，曼哈顿才69平方公里，很小的一块地方却拥有非常强大的功能。纽约每平方公里夜间人口2.7万，峰值则达3.2万，每平方公里一年的经济活动用GDP计算的话是16亿美元。我后来回到国内找对标，国内居然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这几个数据上与之抗衡。最后，我在上海找到一块可以跟纽约对标的地区——上海的老静安区，共7.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夜间人口3.3万人，每平方公里达到14.5亿美元年度产出。老静安区的道路非常密，但是很有条理。这些年我们把城市变成了一个行政区，城区与郊区的界线变得模糊，这导致我们的城市扩大，资源却变稀薄了。至于上海对长三角的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还要做进一步研究，很多方面或许尚不如从前。虽然也有A股交易和外汇交易等新成长出来的事物，但总体而言，上海距离真正的全球城市还有一段

路程要走。

中国目前的开放还处于吸引资源、建立货物贸易区的阶段。多年来我们的思维方式局限于中国的区域之内，一讲问题就是国内，企业家一办企业就是国内市场，而硅谷的初创企业，它的商业计划一开始就在谋求全球布局。反观我们，仍然框固在中国区域的视野内，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会影响到中心城市功能的发展。

接下来，中国将要进入更高水平的开放阶段，什么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对外输出，而不是一味地对外索取。上海需要选择其他城市难以做到的事情作为目标，比如对外国开放，对全球开放，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上海务必抓住机会，使高端对外服务的载体落于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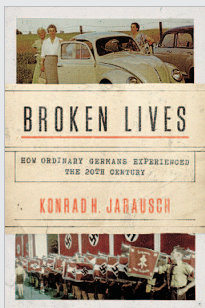
在人才聚集方面，上海已经有相当明显的优势，而上海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房价过高。成群的人才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将来会为这座城市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初来乍到，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立足于此，这

是亟待上海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旧有的房地产模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我认为上海可以学习深圳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深圳有1371个城中村，过去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制拆除，实际上是拆不掉的，因为有市场在，有几百多万刚到深圳的打工者在那里落脚。现在深圳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鼓励万科等公司带头整合，把城中村里的房子租给市场，然后再整体改造成人才公寓，这是可供上海未来发展参考和学习的。最后，上海要吸引全球资源，还须加快措施改革，比如中国的移民政策正在向现代国家的移民政策转变，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面向全球吸引人才的，这件事情在国内也只能由上海带头来做。

总的来说，我对全球城市的理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聚集优质资源，高密度地凝聚于此，并加以有效组织，然后向周围地区产生广阔的辐射力，全球城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文明。我的理解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整理/薛晓倩)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周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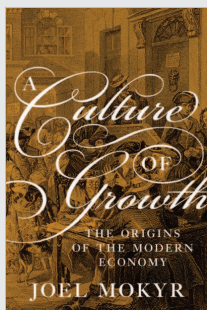


《破碎的生命——德国平民如何经历了20世纪》(Konrad H. Jarausch)

以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历经六代的回忆录为依托，作者记述了发生在这些平民身上的令人难忘的故事——他们都在希特勒时代长大，陆续经历过第三帝国、二战、大屠杀以及冷战的破坏和摧残，也见证了德国在战后惊人的修复能力和统一过程。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里，回忆录中的这些证词回顾了希特勒时代一些年轻人卷入纳粹运动的错误。早期的热情逐渐付诸深刻的幻灭。前线作战、集中营里的谋杀、国土上空的轰炸……这些成为野蛮的独裁帮凶的事实，逐渐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变得清晰起来。

究竟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会支持希特勒，并忍受多年的战乱和纳粹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他

们最终如何摆脱种族主义的阴霾，转而拥抱人权？在作者看来，通常被历史学家们所诟病的这一代人基于对自身苦难的尤为关注，最终孕育了对国家认同的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也有助于德国完成从军事侵略者到欧洲民主的支柱的形象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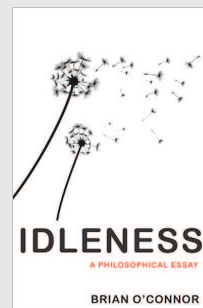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Joel Mokyr)

启蒙文化为何引发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欧洲的创新引发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范围内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关于工业革命的细节已经数不胜数，但有些问题依然成谜：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别处？为什么它能持续发展并促成延宕至今的空前繁荣？在这本不无突破性的著作中，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和启

蒙运动时期特有的、关于增长的文化现象，为科学进步和开创性发明奠定了基础。通过整合经济学、科技史和文化演化模型，莫基尔阐释了，文化，即那些能够改变社会行为的信念、价值和偏好，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他向我们展示了在1500至1700年间，一个在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却培养了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启发了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同时，由一群杰出思想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此期间自由地传播和分享思想和著作。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和鼓励知识爆炸的环境，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尽管两者当时的科技水平相近。在欧洲，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家们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庇护所，并能跨越国界传播自己的思想。相比之下，中国版的“启蒙运动”仍然由作为统治阶级的精英所掌控。

《空闲》(Brian O'Connor)

数千年来，空闲和懒惰总是被视为一种恶习。人们所期望的是通过劳动来获取生存资料，而把精力浪费在劳动和自我提升以外，则被视为奢侈的行为，甚至是一种道德不端。对于这种传统观点，现代哲学家们一直以来没有提出质疑。《空



闲》一书则首次挑战了现代哲学对于空闲的否定，指出空闲的状态反而是一种真正自由的体现。作者考察了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哲学家如何将人性的充分实现等同于避免懒惰：在康德那里，人们要作为整体而变得自主，就必须拒斥空闲；在黑格尔那里，要接受社会规范，就必须拒斥空闲；在马克思那里，要通过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在叔本华和波伏娃那里，则是要避免无聊。作者对上述观点均提出质疑，并对一些原本不受重视的对于“空闲”的积极看法予以肯定，其中包括罗伯特·伯登(Robert Burton)的忧郁分析，以及席勒和马尔库塞关于游戏重要性的思考。

《信念共和国》(Kaushik Basu)

为什么有时候好的法律难以被实施？当法律未被执行时，是法律本身的失败还是执法者的问题？最

重要的是，如果法律只是纸上的文字，为什么它们有效力？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考希克·巴希(Kaushik Basu)认为，新古典主义法学经济学分析存在重大缺陷，故而未能圆满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替代方案，来理解经济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借助现代博弈理论，巴希发明了一种“焦点”方法，将守法公民的自利行为和执法者的行为两者结合进行建模。他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规范和法律之间的联系，让我们看到那些算无遗策的设想如何造福人类。例如，在食品补贴计划中，应直接向穷人发放优惠券，以防止店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补给粮。通过强调法律和经济各自的可能和局限，巴希为理解法律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也为提升法律效力和社会公正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